

從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看國內中小學圖書館之發展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Library in Taiwan: Based on the Nine-year Joint Curricula Plan

陳澤榮

Tze -rung Chen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 trchen@mail2000.com.tw

【摘要 Abstract】

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使教育朝向多元之發展，課程設計與統整、教學模式多樣化以及連貫的教材編制將使國民教育更具生活化與國際化。本文將以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進一步探討中小學圖書館在教育上所應扮演的角色，並討論中小學圖書館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對於中小學圖書館未來發展的影響，藉以提升中小學圖書館的專業地位與其正常之運作。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the Nine-year Joint Curricula Plan places on school libraries with an aim to establish professionalism and to institut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for school libraries in Taiwan. School librar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n education system, where the Nine-year Joint Curricula Plan guidelines call for a better course structure and integrated subject teaching.

關鍵詞 Keyword

中小學圖書館 教育改革 九年一貫課程 教學支援

School library ; Education reform ; Nine-year Joint Curricula Plan ; Instruction support



參、圖書館之價值與服務

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影響圖書館最大的改變是科技突飛猛進，見諸於圖書館自動化，網際網路(Internet)，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簡稱WWW)等方面。但是和同一時期的重大政治、社會、經濟變革相比，其變更不能說太大。此時期見諸於政治、社會、經濟的重大變更，有東歐共產制度解體、冷戰結束、婦女運動興起、貿易全球化、世界經濟形成、傳播媒體全球化、醫學日新月異、全球恐怖主義盛行等。然而圖書館之終極目標是服務，服務本身是理念或結果，是目的或手段，有相當值得探討的空間。(註 32)本節即將討論圖書館之價值與服務。

一、圖書館之價值

由前第貳節敘述歷史上各時代圖書館各有其時代任務，乃由於圖書館有其歷久不衰的價值。Michael Gorman(高曼)在其《Our Enduring Values: Libraria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探討圖書館事業之中心價值(Values of Librarianship)有八：(註 33)

1. 典掌(Stewardship)

保存人類記錄傳之後世，培育圖書館員以傳承價值觀與實務，圖書館是典掌處所，為社區所重視。

2. 服務(Service)

評估服務倫理所產生的圖書館政策與作業，為當前個人、社區與社會，以及後代子孫提供最佳的服務。

3. 智識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

致力於維護自由社會中所有民眾自由閱聽的理念，維護社區中所有成員的智識自由，維護少數意見的自由發抒，確保圖書館的設備與項目能為所有民眾利用。

4. 理性主義(Rationalism)

以理性態度組織與管理圖書館資源與服務，將理性主義與科學方法應用於所有圖書館業務。

5. 讀寫素養與學習(Literacy and Learning)

培養讀寫素養和激勵學習，鼓勵終身不斷的閱讀，使圖書館成為讀寫素養教學中心。

6. 平等取用(Equity of Access to)

克服所有技術與財源上的困難，使民眾能平等取用記錄的知識與資訊，以及所有的圖書館資源與服務。

7. 隱私(Privacy)

保障圖書館記錄使用的隱密性，克服圖書館使用的技術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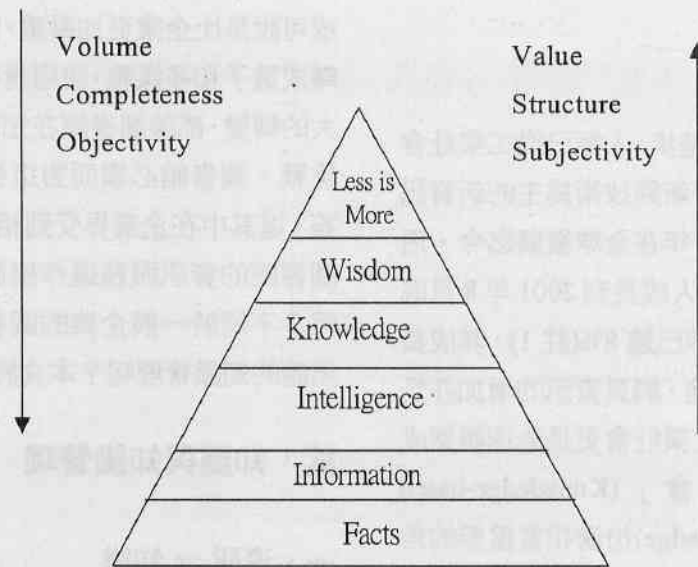
8. 民主(Democracy)

參與對民主社會價值之維護，參與教育過程以培育民主所需的良好公民，將民主原則應用於圖書館。

總言之，圖書館事業之中心價值在服務，圖書館是平等取用記錄的知識與資訊的社會機構之一，資訊科技之突飛猛進使得個人隱私之維護較以前更形急迫。廣義而言，在民主社會，圖書館管理應落實民主原則，並應以理性主義落實其業務及服務；此外，圖書館要捍衛民眾智識自由與培養其讀寫素養，並要肩負起典掌知識與資訊以完成歷史傳承之責任。(註 34)

在以下討論圖書館服務之先，圖書館諸多價值之中，圖書館重視閱讀，故於本段之末探討之。閱讀在人類社會有長久的歷史。二十世紀早期圖書館界即對閱讀重視，芝加哥大學教授 Douglas Waples 於 1931 年即做有關閱讀對社會科學貢獻之研究指出，美國之閱讀民眾，據估計約佔全體人數的 95%，其重要性可見一斑。(註 35)而在電視出現以前，閱讀是獲取和傳佈價值觀和意識理念最佳方式。但是閱讀的素材及題材，歷來皆有討論，各時





圖一：資訊階級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Haeckel & Nolan(1993)

“From Facts to Wisdom: the Information Hierarchy”

學者對知識的分類又因類別和內涵而有所差異，但都是為能提供對知識更詳盡的理解。其中最被常引述的是 Michael Polanyi 於 1960 年代即提出的論點(註 8)，他認為知識可分為記錄性(或外顯)知識(Codified/Explicit knowledge)和默會(或內隱)知識(Tacit/Implicit knowledge)。記錄性知識可藉由各種符號有系統地陳述，同時也能將其資訊數位化。(註 9)換言之，以文字等表現出來的報告、手冊、電腦檔案等皆屬之；而默會知識則是無法以文字表達或量化的。默會知識一般來說是傾向於個人化的，其中夾雜著複雜的因素如宗教信仰等。(註 10)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則由經濟學的角度，將知識區分為四種：(1)Know what、(2)Know why、(3)Know how、(4)Know who，其中 Know what、Know why 及 Know who 屬於記錄性知識，而 Know how 則是默會知識。由黃河明對二者的定義中，我們可以更清楚了解其中的差異性：(註 11)

1.內隱知識：為個人主觀的經驗性、類比性、具各別情境特殊性的知識，通常無法直接辨認，

保存於人身上、製程、關係等形式中，所以難以透過文字、程式或圖形具體條列規劃之形成或向外傳遞，此類知識之傳遞較為費時。

2.外顯知識：為客觀的理性知識、順序性知識與數位知識，可以清楚地辨認，保存於產品、程序、手冊等之具體形態中，且可以透過正式形式及系統性語言傳遞的知識。

二、記錄性知識 vs. 默會知識

圖書館所蒐集、處理及典藏的資訊即是 Michael Polanyi 所指的記錄性(或外顯)知識。記錄性知識可以透過圖書館及資訊技術有系統地儲藏並提供給使用者；但是默會知識卻是無法的。學習游泳或腳踏車即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儘管可以從書籍中或教練的指導學得部份知識，但仍然必須依靠自己「無法言喻」的體會，經過多次的錯誤嘗試(Trial and error)，最後才能得心應手。這就是為何 Michael Polanyi 比喻默會知識為「我們知道的比能說的還要多」(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



(註 12)另外東方傳統的師徒制度，也是默會知識的最佳例證，往往徒弟必須歷經數十年的「觀察、學習」師父的言行，才能學到其中的精髓。這也充分說明「經驗」(Experience)是默會知識重要的元素之一。Ikujiro Nonaka 指出默會知識有兩個面向，其一為技術層面，包括非正式的個人技巧，或者如我們所說的 Know how；其二是認知層面，包含根深蒂固於我們腦中的信仰、理念、價值基模(Schemata)、心智模式，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知覺(Mental models)的方式。(註 13)由於默會知識隱含著經驗，其重要性及困難度均超過記錄性知識，而如何將默會知識轉化成記錄性知識，則是各界相當重視的課題。

二十一世紀無疑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是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知識品質的優劣更關係著企業及國家的競爭力。而記錄性知識由於是透明、公開化的，只要透過適當的路徑即可取得；相對地，要掌握默會知識就困難許多，而必須藉由各種手段才有可能達到。日本的管理學大師 Nonaka 甚至提出螺旋性知識論(the Spiral of knowledge)，他認為「往往新的知識都是從個人開始。」(註 14)也可以說原有的記錄性知識加上默會知識的引導，這就是創新的開始。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圖書館中與讀者最直接接觸的是參考館員，相對地他也會很清楚讀者的使用行為，參考館員如果能將未達到機構當初預期的服務或產品的因素，適時反應給圖書館管理者或行銷部門作為修正的參考，圖書館就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達到服務公眾的目的。相對地此種行為在一般企業來說，關係到企業的利益，更能突顯默會知識的重要性。透過個人的經驗及對專業的敏感度，而使機構能修正產品，服務並滿足機構的利益，這就是默會知識轉換成機構利益的例子。記錄性知識已是企業間共同的平台，如能善加利用機構中無形的默會知識，是企業創造巨大利益的秘密武器。這也是為什麼企業管理層級非常重視默會知

識，管理學大師及企業經營者不斷有論著知識管理，並強調默會知識重要性的原因。

三、知識管理的內涵、目的和其重要性

Marianne Broadbent 強調知識管理已不再是新鮮事，其實在好的企業裡已行之有年；良好的知識管理其實已為企業創造可觀的佳績。但是知識管理到底是甚麼？簡單的說，知識管理就是取得並支配員工的知識和過程的力量，藉以分享經驗，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有效率的經營方式。知識管理應有的特徵是在於一個學習型組織同時能有良好的資訊流動(Information flow)管理。而這些通常表現在機構的四種部份：領導能力、文化、視員工為資產，及結構和過程。(註 15)知識管理不是單純的一組人員在一起研習或只是安置一部電腦化的文件管理系統，它牽涉到「人」和其他資源，例如企業文化、IT 技術等的關係。劉常勇認為有關知識的清點、評估、監督、規劃、取得、學習、流通、整合、保護、創新活動，並將知識視同資產進行管理，凡是有效增進知識資產價值的活動，均屬於知識管理的內容。(註 16)Boynton 提出「知識管理地圖」(如圖二)，由此圖我們可以看出知識有三種層次(默會知識、記錄性知識及資訊)和四種知識的散播方式(個人、小組、機構及機構內部)。知識所含括的內涵(默會、記錄性知識及資訊)是知識管理中重要的元素，如何營造企業的文化、提升知識資產及配合資訊技術工具的利用，將是知識管理能否成功運作的竅門。劉常勇認為知識管理的目的有八項：(註 17)

1. 增加組織整體知識的存量與價值；
2. 應用知識以提昇技術、產品、與服務創新的績效以及組織整體對外的競爭力；
3. 促進組織內部的知識流通，提昇成員獲取知識的效率；
4. 指導組織知識創新的方向；



循由上而下的行政模式進行，在九年一貫課程教育的改革中，教師的角色已經有所變遷，乃由教學執行者躍居課程計劃決定、課程研究設計、課程改革評量與統整實施的關鍵地位。(註 6)因此九年一貫課程實施成敗的關鍵在於學校教師的專業表現與其是否具備「整體規劃、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的能力，由此可延伸出教師整合教材與規劃教學之能力是和其本身所受專業訓練有關，尤其是教師之資訊素養與組織整理資源的能力高低，這對於九年一貫課程而言，是一個關鍵且值得深思的課題。由此又可聯想到教學環境所提供的資源是足以影響教師在教學與自我能力提升上為主要的因素之一，所謂教學環境所提供的資源可以指圖書館、視聽中心、語言學習中心等任何可提供教學支援之單位而言，此說法為狹義之詮釋；廣義而言，教學環境所提供之教學資源乃泛指可能全面性的影響到學校所進行的教學活動。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成敗關鍵可歸納成兩大層面之剖面：(1)環境層面；(2)教育本體層面。環境層面指的就是可能影響教學效果的外在環境因素，如教學支援的不足等；而教育本體層面則是指整個教育制度與政策規劃與執行之相關議題；此外，目前國中、國小圖書館仍缺乏人員編制，必須強化組織始能發揮功能。

參、中小學圖書館利用與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

一、中小學圖書館的教育機能

曾雪娥校長曾提出學校圖書館的基本教育機能如下：(註 7)

1. 中小學圖書館需要具備有教人與教書的經營。使學習者的情意目標和知識的獲得同時達成，也就是達到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功能。
2. 學校圖書館的館藏是以學校、教師、學生的需求為主，需配合學科專家，充實館藏。

3. 學校圖書館不僅是教導教師或學生一些技巧或技術性的活動。是一種科學學科，其學科內容是在學習知識與紀錄知識的資料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套分類與組織的結構學習。

4. 學校圖書館的服務，能夠有效的將這些圖書館的知識資源與發生在教室中的知識、追求的活動相關連。

5. 學校圖書館要能為老師、學生做出任何自我學習研究計劃的服務，奠定讀者終身學習的基礎。

由此可知，學校圖書館除了兼顧教育功能，同時又必須肩負支援教學活動的任務，尤其目前的教育型態已走向多元化發展，傳統教室已不再是唯一的學習場所，因此圖書館就是教室延伸的學習場所，圖書館可以提供獲取知識最理想的場所之一，但是相反的，儘管我們如此強調圖書館的重要性，但卻不表示我們否定了教室存在的功能，因為在國小與國中階段，個體在知能發展、人格發展或情緒成熟度方面，還未達到穩定的發展。因此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能獨自自主的到圖書館自我學習，所以仍然需要成人來進行規劃，等到個體成熟後，才有機會讓他們獨立學習，發揮個體特性，但不可諱言的是，學校圖書館不僅是學生的延伸學習場所，同時更是教師在研究設計課程與教學活動一個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源，因此學校圖書館的教育機能不單單只是偏重學生的服務機能，而也包括了教師在決定教材與課程改革的一項重要的提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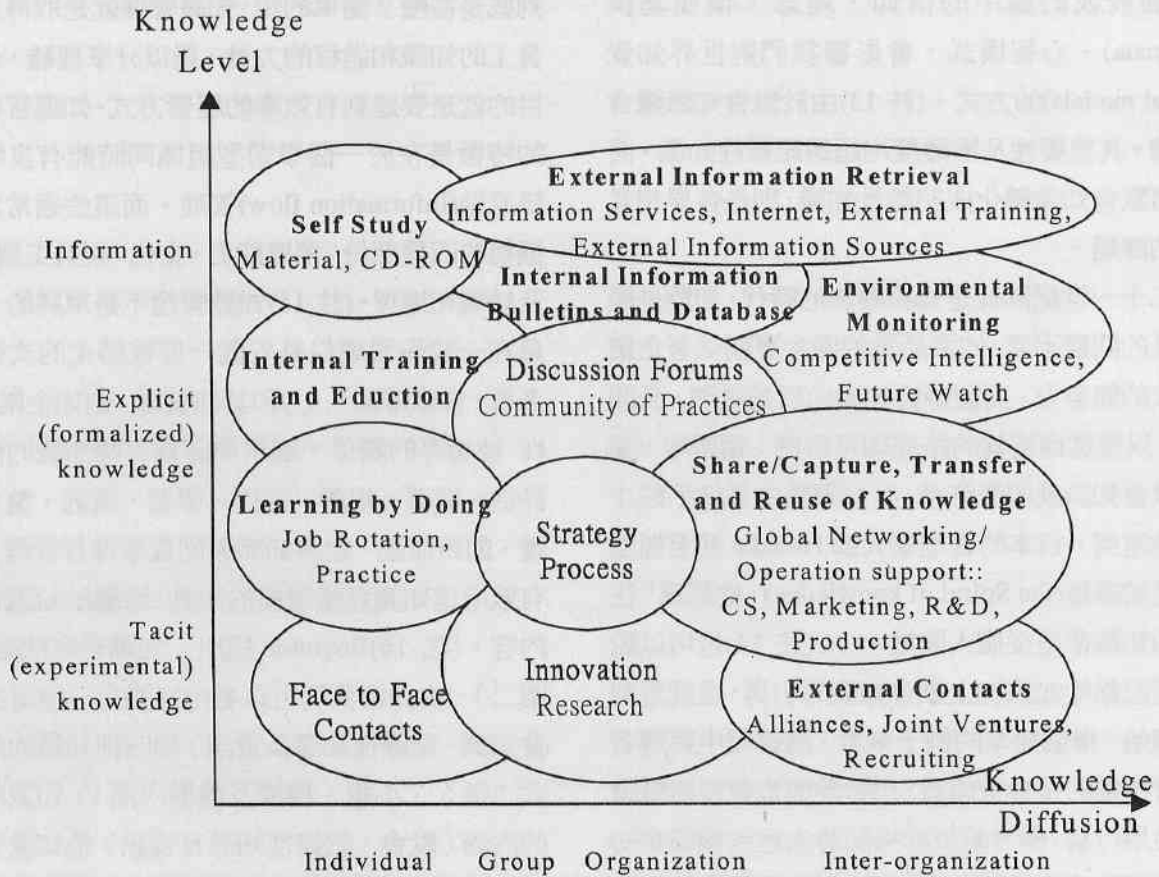
二、台灣地區中小學圖書館之現況

中小學圖書館可區分為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特殊學校、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五種。台灣地區中小學教育可以說相當普及，在現行的各級圖書館的質與量均有顯著成長，尤其是高中圖書館，其原因是在民國七十七年教育部實施了「改進高級中學教育計劃」，其中推動了「發揮圖書館功能計



- 5.協助組織發展核心技術能力；
- 6.有效發揮組織內個體成員的知識能力與開發潛能；
- 7.提昇組織個體與整體的知識學習能力；
- 8.形成有利於知識創新的企業文化與價值觀。

種種的知識管理理論都顯示：知識管理並不是企業最終的解答(Solution)，而只是善用企業內各種專業的一種方法，也可從其中窺探出知識管理對企業的重要性。



圖二：知識管理地圖(Knowledge management map)

資料來源：A. Boynton,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How to Get Started,"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Symposium* (Sydney: IBM Consulting Group, 1996).

參、資訊服務所面臨的挑戰

由於圖書館不同於一般企業以獲利為目的，儘管知識管理在企業經營已獲得廣大的回響，並藉由各種學理熱烈討論，在圖書館界似乎並不如預期。

但是隨著資訊技術的進步，已不容圖書館置身事外，除了圖書館內部自身的管理，圖書館也必須思考在知識經濟及知識管理的時代下，所提供的資訊服務如何面對挑戰。以下分別就知識管理在圖書館組織內部和資訊服務所遭遇到的困難及挑戰作一



劃」，使得高中圖書館主任編制明確，讓高中圖書館推展業務得有進展。但是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圖書館之營運狀況就不夠理想，其因素不難歸因於教育制度的缺憾，如：升學制度、教條式教學等。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圖書館館藏質與量的缺失與專業圖書館員及圖書教師任用與編制仍需予以明確化。

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與學校圖書館的經營

九年一貫課程的統整，乃從肯定每位學生皆具有多元智慧的八大智慧而來。因此，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應當要力求統整而不力求片斷為目標，同時學習時不應分科太細。尤其九年一貫課程的目的是在提高學生生活的基本能力，所要求的是本位導向的學習模式，學生在學習知識過程中就等於在培養：建構知識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適應的能力和彈性應變的能力。只有這些能力才是真正解決生活的能力。九年一貫課程的重要特點在於兩項：一為統整課程，二為彈性課程的實施，學校圖書館可從這兩方面來積極經營。(註 8)在統整課程方面：是依據學生在生活中的問題是以全方位的學習來解決，而非零碎的學科知識記憶，因此以課程統整的問題解決法來教學，可以讓學生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和周全的方法。圖書館應配合統整課程的發展而充實館藏設備，做好圖書館的教學資料選粹服務(SDI 服務)，建立學校圖書館的服務專業性，以提供全校師生最佳的教學利用。(註 9)彈性課程方面：可以依據學校的教師、家長的專長及學生的興趣來編排規劃，依據社區的鄉土民俗來發揮，使教學本土化，融入深厚的社區情感、社區文化、社區參與、社區關懷。這就是彈性課程可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調整，當然這必須要在專業的教育理念下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主而規劃設計的。因此學校圖書館應配合彈性課程的發展而充實館藏建立館藏特色，以提供全校師生的教學應用。

教學資源的整合與圖書館利用始能實現九年一貫課程之基本精神，從課程改革的角度來看，將暗喻著圖書館發展與運作將是影響整體課程發展與改革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除了教育改革，學校圖書館的發展與運作，應是未來教育界所應當體認與重視的一環。

肆、由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看中小學圖書館之發展

90 學年度起九年一貫課程將正式在國小一年級實施，然而學校圖書館為了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需要，勢必要努力改變以往傳統的經營方式，才能提高中小學圖書館的專業地位與發揮圖書館在教育上的功能。針對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學校圖書館應該在功能上與其發展方向應有重大的變動，在此提出幾項供中小學圖書館訂定政策時可參考的依據：

一、學校圖書館是教學支援單位

九年一貫課程以朝向教學多元化與科技化為目標，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讓教學更富有彈性與發展空間，讓教育與生活做全面性的結合，因此九年一貫課程主張學校與老師在教學上有更多的教學自主權，如：學校本位發展，這將意味著未來國民教育是以主體本位為發展目標，可以視不同的環境與需求發展獨特的教學方式，因此為了配合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之改變，學校老師在設計課程就更需要豐富的資源，學生也需要更多元的管道進行學習，不可諱言，學校圖書館是應付這些需求最佳的供應者。學校圖書館成了教材資源中心，未來中小學圖書館勢必成為九年一貫課程各領域的全方位資料資源中心。

二、學校圖書館是取得外部教學資源的最佳管道



深入討論。

一、知識管理在圖書館組織內部

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圖書館，都是教育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藉由圖書館所典藏的各類資訊，透過使用者轉化成知識、創新進而產生產品，無論從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圖書館館員均扮演著知識傳播及領航的角色。而一個組織能有好的資訊流動(Information flow)管理就是知識管理應有的特徵之一，在上述知識管理的重要性中，也在圖書館管理中充分表現無疑。誠如 Marianne Broadbent 所言：領導能力、文化、視員工為資產及結構和過程是知識管理的重要元素。其中「視員工為資產」正是默會知識的重要元素。同時 Davenport & Prusak 也提出組織中的「人」才是資訊與知識創造分享的重點。(註 18)一般而言，大多數的圖書館均處在館藏資料不足、館員專業素質不足、人員編制及任用缺乏彈性、缺乏適當的工作激勵、組織編制僵化……等等困難中。儘管圖書館內部的員工（即館員）人數不多，而且不是主要知識生產者，但在知識的保存、加工與傳遞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圖書館組織內部，妥善運用通行於企業的知識管理，必然可以適度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就如同一般的企業，圖書館館員是圖書館重要的資產，也是圖書館能否提供使用者的滿意服務的因素之一。如何推動圖書館內部的知識管理呢？Boynton 提出的四個步驟(1)讓知識透明化(Making knowledge visible)；(2)建立知識持久性(Building knowledge intensity)；(3)發展知識文化(Developing a knowledge culture)；(4)建立知識的基礎建設(Building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註 19)

但是應該如何讓知識透明化，進而發展持久性的知識文化呢？特別是默會知識透明化的困難度應是更高。目前很多企業或機構建立內部的知識管理資料庫，藉由資訊技術為平台，要求員工將個人

手上的資料包括工作日誌、技術報告、會議心得感想等等，都放在內部的知識管理資料庫，以供內部分享經驗。經濟部技術處 IT IS 計畫經一年三個月和 Arthur Andersen 合作將知識管理導入實務，應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後來雖使用的滿意度佳，利用頻率亦高，但是數據資料庫和分享文化則有待加強。(註 20)顯然分享文化的建立是知識管理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除此之外，還可以藉由成立小組的讀書會相互討論(Discussion forum)、經驗的交流(Experience sharing)、主管對組員傾聽的態度(Listening)、或透過參訪國內外相關單位(Visiting)等方式，獲得館員經由經驗或學習而得到的默會知識。

建立內部知識管理庫是一個累積默會知識的可行方式，但是就如同專家們所言，「人」才是資訊與知識創造分享的重點。因此以更簡單方式來表達，就是應建立學習型圖書館(Learning library)及加強對專業核心能力與角色認知。

(一)建立學習型圖書館(Learning library)

面對快速變化的資訊社會，圖書館館員再也無法以「一招半式」就做到老做到死。近年來，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在受到 Peter M. Senge 所著《第五項修鍊》(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所影響，學習型組織正不斷受到重視。什麼是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係指組織能透過各種有效的途徑與具體措施，促使其成員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從學習過程中激發個人生活潛能，並提昇人生價值以充分實現自我，並進而帶動組織的創新與進步。(註 21)學習型組織的概念其實和知識管理是不謀而合的。他們都是以重視「人」為出發點，藉由員工不斷地學習，進而帶動組織的創新與進步而達到滿足組織的利益。



九年一貫課程主張「學校本位發展」，學校可以按照社區的需要、學校條件、家長期望與學生需求等因素，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每個學校可以各自發展不同的教學特色。學校單位將可能成爲一個具備社區意識與兼具社區特色的教育單位，同時在社會、社區、學校與教師之間發展成爲一種合作夥伴關係，因此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雖然是以學校爲主體，但也必須重視校內外各種人力、資源的運用與整合。如此一來，學校圖書館服務對象將再不限於本校師生，爲了促進與夥伴關係之間的互動與連繫，可先從圖書館出發，圖書館可以搭起學校與社區之間的橋樑，藉由圖書館提供的服務機制，可以建立與維持彼此之間的關係，如此，更能輕易取得校外資源，以利教學課程的需求。

三、學校圖書館是課程改革的顧問

九年一貫課程主張「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因此課程的發展強調多樣化、地方化與適用性，其優點便是能立即回應社會、社區、學校、家長與學生的需求。因此學校圖書館可以收集不同回應需求與各方之意見，藉此不僅可以調整圖書館內部服務與館藏內容，又可以提供學校在課程改進與發展的一項重要的參考指標。除此之外，學校圖書館可以主動的透過「圖書館利用調查」，瞭解讀者利用圖書館之情形，以便於校方在規劃課程與改進課程發展上一個重要的參考，綜合上述所言，我們可以說學校圖書館是課程改革的顧問。

四、學校圖書館應建立課程支援基礎建設

九年一貫課程設計的自主權已全面下放給學校與老師，老師擁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再加上教育改革主張教學應朝向多元與創新的目標發展，因此未來的學習資源將是愈形複雜，假如缺乏系統性與組織性的整理，容易造成老師設計課程與學生學習上的阻礙，最後將造成老師與學生不知所措。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培養學生的十大基本能力，其中第七項指出在培養學生「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能」與第八項「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因此爲了讓老師與學生在實現課程目標與學習效果，圖書館有必要建立「課程支援基礎建設」，所謂課程支援基礎建設是建立一套有系統的教學資源，提供老師在設計教材與尋求教學靈感的一個管道，藉由圖書館提供的各種主題式資源、有系統與多元化的教學素材，讓老師逐步尋覓出一套可行的教學設計。在此提出幾項圖書館建設課程支援基礎建設所應包括的項目內容：

(一)加強其他類型資料的蒐集

除了紙本圖書資料的收集，應大量補充多媒體資料的典藏，如：電子書、多媒體互動光碟、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視聽媒體、地圖資料等各類型資料。九年一貫課程特別注重學生十大基本技能的提升，圖書館不應只偏重某一特殊資料類型爲徵集對象，應視學校課程發展的需求，適切提供資源。

(二)建立教學與學習管道

圖書館應努力建立一套符合學校課程需要的學習管道，此學習管道分爲三大層面：(1)老師層面；(2)學生層面；(3)社區層面。在老師層面方面，要建立一套輔助老師發揮創新課程設計的暢通管道，如：教學方法相關資源、對外館際合作、結合地方社區資源，如各地公共圖書館、文化中心等。在學生層面方面，除了提供圖書館應有的基本服務功能，應該針對學生需求與配合課程需要，提供更多元的服務功能。在社區層面方面，由於九年一貫課程著重「學校本位發展」，因此除了努力學校本體的發展，更要與地方社區的資源結合成爲一套學習連結系統管道，讓學校與社區充分結合，以利於發展各學校之學校本位與提供老師與學生在教學上與學習上一個暢通的管道。



指可能是視聽中心、語言教室、電腦輔助教學中心等。未合併教學資源中心之前，以館藏內容的徵集與館藏深度等，必須先針對這些合併單位進行資源調查工作，明確的瞭解各單位的資源配置，以做為館藏政策中之淘汰政策訂定之參考。

七、合作館藏發展

九年一貫課程主張「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統整化教學」，此重大改革將帶領學校課程革新的嶄新趨勢，同時也使學校圖書館在館藏發展與資訊服務帶來全面性的改變，要如何因應教育革新與追上教育改革的腳步，讓讀者充份瞭解圖書館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是未來學校圖書館所應有的體認。之前已詳述過九年一貫課程的特色與發展目標，尤其以學校本位與統整教學最為顯著，因此當學校在努力發展各體本位特色的同時，容易出現教學資源之獨具一格缺點，這將容易造成多元發展的絆腳石，因此爲了要解決此一窘境，合作館藏發展將是一項可行之解決方案，合作館藏之對象不一定是其他學校之圖書館，可能也和社區之公共圖書館或是鄰近大學圖書館等單位配合，合作的目的是以教學爲出發點，提供參與合作之學校單位一個課程支援的管道。

伍、結論與建議

九年一貫課程教育改革給予了中小學圖書館一個重振雄風的機會，教育界與圖書館界應緊跟這股潮流，提供中小學圖書館一個揮灑的空間。教育界與圖書館界也應有提升圖書館專業地位與正常運作之共識，讓圖書館真正發揮其應有之功能與任務。美國教育家 John Dewey 曾經提出「教育及生活，教育即發展」的教育理念，就代表教育是要和生活密切的配合，並且要迎合與顧及時代之變遷所帶來的需求。因此個體必須不斷接受教育，不斷充實各方面的知識與吸收經驗，如此才能適應這個變

遷的社會。有關這方面的因應對策，圖書館就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與份量，在此提出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圖書館是支援教學中心

課程是教育活動的核心，圖書館乃在協助教師達到教學目標，必須配合其教學活動，提供完成單元活動所需要的資源與設備。尤其是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老師必須獨立或是以團體合作的方式規劃課程內容，因此未來從事教育的工作者勢必都會有研究教育理論與實務方面的資訊需求，這些都要靠圖書館的支援與配合才能協助教師在從事教學活動，也才能提升教學水準與達到教育改革的期望目標。

二、圖書館應擬定資源利用原則

正如同本文探討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一樣，圖書館在面臨各種教育改革措施的同時，無非要時時注意教育改革的走向與圖書館本位發展的適應能力，在訂定館藏發展政策時應該配合教育措施的實施狀況，如，應該考慮到全校所有教材教具的管理與使用原則，尤其是視聽中心或是教務處的教學資源或設備，同時更要配合校內各種課程設計的需求，徵集必要的館藏。(註 12)

三、結合人力、物力與爭取各方支持

合作館藏發展即是此建議之最佳捷徑，前面已提及，合作館藏發展是不限於圖書館之硬體等資源之共享之服務，可能也包括了人力、外界組織力量的貢獻而有所推廣，因此當我們在高呼圖書館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的同時，不妨先自己走出來，引起外界的注意，藉以吸引大眾之目光，讓圖書館在社會上重新的被定位與認可。

圖書館應和學校維持親密的關係，圖書館館藏服務可以提供學校教育相當程度的教學支援，因此



一、傳承久遠的浙江地方文獻事業

浙江素有「人文淵藪」、「文獻名邦」之美譽，地方文獻的產生源流悠長，數量浩繁，代有創新，名編佳作疊出。《越絕書》開中國地方誌編制之先河；《蘭亭序》越千百年美譽不絕；宋元名志《臨安三志》、《四明六志》、《會稽二志》流存迄今，歷久彌貴；民國《鄞縣通志》、《龍遊縣誌》等著稱近世。清中後期以降復起編刊郡邑叢書之高潮，《台州叢書》、《金華叢書》、《武林掌故叢編》、《吳興叢書》等數十種鴻編巨制競相爭妍，涵蓋浙境全輿，囊括古今篇什，浙地鄉土文獻之編制由是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和影響。

浙人在地方文獻的搜集、保藏與傳播等方面同樣有著優良的傳統與驕人的業績，諸多有識有力之學者賢達為此傾注了極大的心力。明清以來浙江的私人藏書事業持續興盛，雄視海內，其中如天一閣、淡生堂、天籟閣、曝書亭、八千卷樓、皕宋樓、嘉業堂等著名藏書樓俱以富藏地方文獻著稱。許多藏書家如阮元、丁丙、孫衣言、陸心源、劉承幹、張壽鏞等並因此擁有富實的文獻資源和便利條件編刊了彙總一地的文獻集成。

1936年11月，國內首次也是規模最大的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在杭州舉辦，展出省內外公私收藏的浙江圖書文物6,000餘種，2萬餘件（冊），是時觀者如潮，影響空前，是為徵集、檢閱、宣傳地方文獻的一大盛舉。

浙江圖書館作為國內創辦最早的省級公共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著重亦始終如一。1917年經浙江省省長公署審定頒發的《浙江公立圖書館辦事細則》中，首次明文規定：「對本省鄉土藝文及名人手寫本亦應隨時注意訪購」。1916年11月、1934年7月，經浙江圖書館提議，浙江省行政當局先後兩次通令全省各縣向浙江圖書館繳送當地碑碣石

刻拓片、新編地方誌及新編地圖，極大地豐富了浙江圖書館的地方文獻收藏。即使是在動亂的年代，浙江圖書館對地方文獻的搜集與保護仍不遺餘力，多有建樹。抗日戰爭時期大規模徙移、保護館藏珍貴文獻，「文化大革命」期間艱難徵集、收藏了全省各地編印的750餘種小報及其它大量「文革」資料，為研究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歷史保存了珍貴史料。1996年，浙江圖書館成立地方文獻部，始有獨立機構專司其職，闢有地方文獻專門書庫和閱覽室，系列化、規模化建設本省地方文獻體系的工作由此步入快車道。目前，業已形成以新編地方誌、地方年鑒、地圖、中共黨史文獻、浙江地方報刊為主幹的當代地方文獻體系。浙江省各市縣圖書館如紹興圖書館、溫州圖書館等的地方文獻工作也皆以電子網路手段與地方特色相結合，呈現別有洞天，各領風騷的局面。

二、當代浙江地方文獻的種類

浙江當代地方文獻的產出在20世紀的後50年呈現截然懸殊的兩個時期，在前30年（50、60、70年代），囿於其時政治、經濟等形勢，所出寥寥，可以蕭寂狀之；在後20年（80、90年代，大致與改革開放同期）因經濟持續發展、文化需求激增、政府支援有力、民間熱情高漲等因素，各類地方文獻的編撰、出版呈現持續活躍、超常發展的局面，無論文獻的數量還是種類均遠超前代，無愧盛世。

地方文獻的類型從文獻形態上看，包括圖書、報紙、期刊及散頁文獻；從載體看，有紙質、影像、電子、綢布、金石等。限於篇幅，本文的論述僅涉及圖書類文獻，當代浙江的地方文獻以內容體裁區分大致有以下種類：

（一）地方誌

地方誌作為中國獨有的地方文獻主要品種，在



新的歷史時期已被賦予新的內涵和功能，其編制受到各級政府普遍重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漸興的修志熱潮延續至今，浙江各地已修成印行的各類方志至少達 1,600 種，其類型包括有：

1. 政區綜合志，市級的如《寧波市志》（1995）、《台州地區志》（1995），縣區級的如《紹興縣志》（2000）、《普陀區志》（1992），鎮鄉級的《南潯鎮志》（1995）、《信智鄉志》（1990）、《小營街道志》（1996），及村級的《浦聯村志》（1996）、《鮑家村志》（1995）等；

2. 市縣地名志，如《杭州市地名志》（1983）、《奉化縣地名志》（1987）等，各市、縣（區）均有；

3. 省市縣各級專業（專門）志，如《浙江省文學志》（2001）、《浙江省水利志》（1998）、《麗水地區佤族志》（1992）、《溫州海關志》（1996）、《湖州絲綢志》（1998）、《衢州柑桔志》（1997）、《縉雲姓氏志》（1999）、《海鹽縣方言志》（1992）、《蘭溪人大志》（1992）等，是新編方志中數量最多、品種最富的一類；

4. 機構實體志，如《浙江圖書館志》（2000）、《富春江水電站志》（1993）、《杭鋼志》（1985）、《瑞安中學校志》（1991）、《阿育王寺志》（1989）、《國清寺志》（1995）等；

5. 山水石志，如《浙江海島志》（1998）、《西湖志》（1995）、《莫干山志》（1994）、《普陀洛迦山志》（1999）、《甌江志》（1995）、《武義瑩石志》（1994）、《昌化石志》（1998）、《縉雲石小志》（1996）、《苧蘿西施志》（1991）等，為數不多卻特色彰顯。

浙江省的第一輪修志尚未結束，作為地方誌主幹的市、縣級綜合志除極個別外已基本出齊，省級專業、專門志已出 30 餘種，計劃在 2005 年出齊；第二輪修志已在浦江、義烏、岱山等地啓動。

(二)地方史

與地方誌相類，浙江各地當代編印的地方史文獻呈現數量較多、門類豐富等特點。其主要構成包括：

1. 從時間上區分，有通史、斷代史，如《浙江通史》（多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起陸續出版）、《當代浙江簡史》（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當代浙江研究所編，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一版）、《溫州近代史》（胡珠生著，遼寧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第一版）、《台州會要》（台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編撰，中華書局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上下二卷）、《江山民國史稿》等；有階段史，建國 50 周年、改革開放 20 年、中共建黨 80 周年、建縣、撤縣建市周年等總結紀念性文獻，如《浙江百年滄桑》（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浙江省土地管理局編，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一版）、《新浙江五十年》（浙江省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浙江改革開放二十年》、《杭州五十年》（金勝山主編，杭州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一版）、《崛起的港城——北侖建區十五年紀事》（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政府辦公室編，寧波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等；有大事記，如《浙江文革紀事》（程超、魏皓奔主編，1989 年 2 月印行）、《麗水地區大事記（1949—1998）》（麗水地區地方誌辦公室，1998 年 8 月編印）、《蕭山百年百事》（蕭山市委宣傳部等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2 月第一版）等；有史料，如《明實錄類纂/浙江上海卷》（李國祥、楊昶主編，武漢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一版）、《浙江出版史料》、《申報嘉興史料》（嘉興市檔案館、嘉興市檔案學會合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2001 年 12 月已出第七輯）等。

2. 從內容上區分，有政區史（省、市、縣、區、鄉、村各級）、機構實體史（廠、校、館、場）等，



尤具特色的是行業史和專題史，如《浙江文化史》（滕復等編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第一版）、《浙江金融史》（陳國強主編，中國金融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絲綢史》（朱新予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一版）、《浙江航運史》（童隆福主編，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一版）、《浙江當代漁業史》（張立修、畢定邦主編，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第一版）、《浙江廣播電視二十年》、《溫州華僑史》（溫州華僑華人研究所編，今日中國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第一版）、《臨海物價史》（臨海市物價局編，1998 年 5 月印行）等。

另有地區革命史和中共黨史文獻因其數量較多，宜單獨歸類。

3. 地區革命史，有專題史如《浙江人民革命史畫冊（1840—1949）》（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浙江攝影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一版）、《浙江抗日戰爭史》（樓子芳主編，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第一版）等；有政黨團體史，如《浙江民革 50 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浙江省委員會編，2000 年 9 月印行）、《紹興工人運動史》（紹興市總工會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寧波青年運動史》（羅悅明主編，寧波出版社 1996 年 4 月第一版）、《象山婦女運動史》（象山縣婦聯編，1995 年 3 月印行）等；有革命史料，如《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選輯》（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會、浙江省圖書館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第一版）、《溫州進步戲劇史料集》、《浙東抗戰與敵後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寧波市新四軍暨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第一版，共 9 卷）等。

4. 中共黨史，有各級組織史資料（省、市、縣區），因系組織編撰，故形制劃一，連續出版，系列配套；迄今，省、市、縣（區）三級共一百個行政區域皆編有，普遍為三卷，如中共杭州市組織史

資料第一至三卷分別為：(1)1922—1987 年、(2)1988—1993 年、(3)1994—1998 年。有大事記（省、市、縣區），如《中共浙江黨史大事記》。有史實，如《中共富陽地方史話》、《中共鄞縣紀檢（監察）史》等。

(三)地方年鑒（附年報類文獻）

當代年鑒的出版在浙江是近二十年的事。民國時期的二、三十年代浙江曾出版過一些年鑒，此後直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基本未再編撰。八十年代起又逐步興起，並漸趨制度化、規範化、多樣性，形成旺發勢頭。現正常出版的浙江地方性年鑒約有一百四、五十種，業已成為浙江地方文獻中充滿活力和時代氣息的主幹類型之一。

1. 浙江當代年鑒，類型可分四種：(1)地方綜合年鑒（省、市兩級均有，縣區、鎮級個別有），如《浙江年鑒》（1992—）、《杭州年鑒》（1987—）、《桐鄉年鑒》（1998—）、《臨浦鎮年鑒》（1994—1998）等；(2)地方統計年鑒（省、市、縣區三級皆有）；(3)地方專題（專業）年鑒，如《浙江金融年鑒》（1996—）（省級的出版、文物、經濟、郵電、廣播電視等專業皆有）、《杭州科技年鑒》（1996—）（電信、商業等有）；(4)機構年鑒，如浙江大學、省農科院、杭鋼、西湖電子集團等機構均編有。

2. 年度報告，如《浙江藍皮書：2002 年浙江發展報告》（萬斌等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第一版）、《浙江藍皮書：「九五」浙江發展報告》（楊建華、葛立成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區域經濟發展報告（2001）》等，近年來編刊漸多，因其內容厚重、逐年編刊、時效性強等特點，頗受關注。

(四)地方概覽（辭典、百科全書、大全等）

都是概括地反映一地資訊、概況的文獻，除名



壹、前言

美國教育家杜威曾說「教育即生活」，因此教育應當融入生活中，讓學生無時無刻都在學習，並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觀念，以提升整體國家文明的進步。圖書館是保存人類知識財產的重鎮，圖書館可以說是知識的寶庫，以教育的角度思考，圖書館具有教育的功能是不容置疑的。教育事實上是逃不開圖書館的介入，因為教育是在培養學習者吸收新知與獲得過去經驗之傳承，不可諱言，圖書館在教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在九年一貫課程等教育改革的措施中，圖書館勢必也要有所變革，如此才能因應整體教育改革的腳步，配合向終身學習之目標邁進。台灣地區目前約有 3,699 所中小學圖書館，佔了全國圖書館館數最多，約百分之七十四左右，但學校圖書館的全職工作人員卻最少(註 1)，這對於迎接資訊時代來臨與培養學生資訊素養而言，實在是一大阻礙，尤其近年來教育改革聲浪呼之欲出，九年一貫教育也正式起跑，各種教學方式學校圖書館在教學中扮演了不可獲缺的角色，因此教育與圖書館兩者是當不可分離，彼此緊緊相互依賴。

貳、九年一貫課程概述

一、發展背景與催生因素

九年一貫課程教育改革的緣起主要是基於政治民主、社會多元發展的需求，同時也是回應教改的呼籲，知識經濟的新世界、全人教育理想與終身學習社會來臨，所進行的必要改革。下列乃為九年一貫教育改革措施興起之原因：(註 2)

1. 回應教改人士減輕學生負擔的呼籲。
2. 重視知識經濟社會創意學習的要求。
3. 推動全人教育培養健全國民。
4. 落實民主政治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5. 符應本土化與國際化課程發展的世界潮流。
6. 終身學習社會回流教育的強調。

面對著九年一貫課程、多元入學、學校本位管理、教育基本法的實施和變化，有不知所措的感覺，然而它的確是必然要改進的趨勢。故在此資訊社會中，各科的知識在短短的國民教育中是學不完的，教學主要的是教導學生「學習方法」。當機器代替人工、電腦代替人腦，那麼大家應思索人類生存的價值和力量是什麼？是建構知識的能力而不是記憶知識。因為電腦資訊、科技的無往不利，挑戰了各行各業。例如工商業：有電子商務、自動化工廠；因而也挑戰了教學的內容。例如：以資料庫的檢索代替了記憶，所以教學內容重在「知識變能力」，並非片段的知識記憶。(註 3)

二、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與目標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教育改革行動方案」，教育部積極規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新課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佈之「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具有下列四項修訂重點：

1. 以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為課程設計核心架構；
2. 以學習領域合科教學，取代現行分科教學；
3. 提供學校及教師更多彈性教學自主空間；
4. 降低各年級上課時數，減輕學生負擔。

此外，新課程並具有以基本能力取代學科知識；因應國際化趨勢，國小自五年級起實施英語教學；重視學習領域的統整；注重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完整結合課程教學與評量等多項特色。為實現國民教育階段學校教育目的，須引導學生致力下列課程目標：(註 4)

1. 增進自我瞭解，發展個人潛能。
2. 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能力。
3. 提昇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能力。
4. 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



稱有別外，程度上有詳略之分，內容上有綜合與專門之分，體裁上有普通式和辭書式之分。上述類型圖書近年來各地編刊甚多，樣式繁富，已出的圖書實例如：《浙江事典》（喬景才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一版）、《浙江省情概要》（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第一版）、《當代中國的浙江》（喬景才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古今地名詞典》（陳橋驛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9 月第一版）、《中國新興城市/浙江卷》（郭曉勇、朱玉生主編，新華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一版）、《浙江省民族鄉（鎮）概況》（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杭州辭典》（沈者壽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第一版）、《溫州詞典》（殷佩章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11 月第一版）、《麗水市情》（李體傳主編，1987 年 4 月印行）等；另，《寧波辦事指南》（房懷福主編，寧波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二版）、《紹興實用大全》（陶仁坤主編，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第一版）、《杭州百事通》（熊恩生主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01 年 11 月第二版）等類圖書差可歸入。

此外，《浙江之最》（浙江省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第一版）、《上海經濟區工業概貌/寧波市卷》（宋小六、張宏方主編，學林出版社 1986 年 5 月第一版）、《浙江省電影事業概況》（費靜波主編，1989 年 12 月印行）及《浙江民俗大觀》（浙江省民間文藝家協會選編，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浙江名牌產品》（陳耀東主編，1998 年 8 月印行）、《嘉興風情民俗》（王福基、袁克露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一版）、《湖州掌故集》（余方德、嵇發根主編，三秦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等，並各地的橋、菜肴、建築、名（老）店、土特產等專題介紹文獻均是。

(五)家譜

家譜也是傳統的地方文獻主要品種，歷代續修不絕直至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修譜之習一度消匿，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又漸復燃。在浙江的部分地區如麗水、金華、台州等地，修譜普遍且已具相當規模，一些縣如縉雲、青田、永康、義烏、黃岩等縣大多聚居姓氏均已有新譜或在編，杭、嘉、湖、甬、紹等地則相對較少。浙江各地新譜大致有兩種形式，八、九十年代編的譜許多是以「志」或「村志」的名義出現，如縉雲《趙氏志》（1997 年編印）、《仙都麻氏志》（1999 年編印）、《壺溪呂族志》（1998 年編印）等俱是；而《俞溪頭志》（1997 年編印）、《寮前村志》（1996 年編印）、《下徐店村志》（1995 年編印）等則是村志和家譜的混合，往往前編為村志內容如大事記、村史、建設成就、歷任村官名錄等；後編為一姓或多姓的譜系。反映了編修者或有所顧忌或意欲創新的心態。近年來浙江各地所出新譜已普遍直冠宗譜名，體例、內容上均有所翻新，但基本與舊譜相類，如義烏《龔氏三支宗譜》（2001 年編印）、縉雲《五雲趙氏宗譜》、黃岩《余川牟氏宗譜》（1995 年編印）、永康《庫川胡氏宗譜》（2000 年編印）、德清《城關蔡氏家譜》（1999 年編印）等。

(六)旅遊讀物（含山水勝蹟題詠集、會節文獻等）

本類文獻與概覽、大觀之類相近似，但從功能、目的上看還是別有側重，且其數量甚多，故另立之。此類文獻相當龐雜，已出的如：《浙江旅遊指南》（浙江人民出版社編印，1988 年 5 月第一版）、《浙江旅遊文化大全》（俞劍明、林正秋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第一版）、《浙江名勝》（屠樹勳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2 月第一版）、《浙江著名景點導遊詞》（浙江省旅遊局編



- 5.發展尊重他人、關懷社會、增進團隊合作。
- 6.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 7.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能。
- 8.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 9.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的精神。
- 10.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十大課程目標實施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力，實將國民教育基本能力作為教育之指標，因此，未來國民教育發展將邁向新境界，以培養學生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拋棄背不動的書包，與學習繁雜的知識教材」，期使師生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充滿快樂與活潑的氣氛。

三、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實施重點

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與目標，實施重點及特色如下所述：(註 5)

(一)課程綱要代替課程標準

目前各中小學課程之實施，都依據教育部頒布課程標準，舉凡各科課程目標、時間分配、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均有詳細規定。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課程綱要則僅包含課程目標、基本能力、學習領域及實施原則。因此九年一貫新課程降低教育部對課程實施之規範與限制，提供民間教科書編輯者及學校實施課程有較大自主性和彈性，是具體課程鬆綁之教改主張。

(二)以基本能力取代學科知識

過去課程標準偏重學科知識取向，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生基本能力取向，注重生活實際性，培養可以帶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再是背不動的書包與繁重的知識教材。

(三)因應國際化趨勢，國小自五年級起實施英語教學

依據我國現行之課程安排，學生需至國中才開

始學習英語，較各先進國家，似已失去國際競爭先機。九年一貫課程將學習外語的年齡往下延伸，國小五年級起全面實施英語教學，以掌握學習外語的時機，並配合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

(四)重視學習領域的統整

新課程特別強調「活潑、合科統整與協同教學」，打破各科互不連貫之現象。在教師適性生動的教導下，學生各項學習活動皆具有邏輯性與連貫性，如此方可培養出具統整能力且身心均衡發展的健全國民。

(五)注重學校本位課程設計

以往由上而下的課程設計模式，強調全國統一性的課程標準，地方政府、學校與老師缺少發展課程與教材空間；九年一貫新課程則強調「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學生學習中心取代學科本位的傳授；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取代統一課程設計」等觀念，讓學校、老師有主動發展課程、自編教材的機會，既培養共同基本能力，又更能符合地方實際需要。

(六)完整結合教學與評量

九年一貫新課程提供課程設計之依據，並且可以改進教學方式，促進多元評量之實施，使我國民教育進行根本的改革。

(七)融入重要的議題

有鑒於環保、資訊、兩性、人權或生命教育等議題為世界各國所重視，可做為評鑑一個國家是否進步之重大指標，並且與國人生活學習相關。因此，在新課程中將這些議題融入在七大學習領域中，使學生在自然無壓力的學習環境中培養出對這些議題之認識與了解。

四、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成敗關鍵

傳統學校教師是課程教學的執行者，大致是依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一版)、《浙江寺院勝覽》(張嘉梁主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一版)、《浙江洞穴旅遊文化》(周宜森著，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第一版)、《寧波攬勝》(許孟光主編，寧波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衢州旅遊資源通覽》(衢州市國土規劃辦公室編，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第一版)、《象山旅遊人文景觀》(象山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2000 年 10 月印行)等。

勝跡題詠文獻：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蘊厚，歷代名人墨客題詠甚多。近年來各地重視對本地名勝、文化的宣傳，搜羅編印了不少此類書，如《寧波竹枝詞》(寧波詩社編，寧波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一版)、《雁蕩詩千首》(南偉然著，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1998 年 1 月第一版)、《千島湖清韻》(中共淳安縣委宣傳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第一版)、《余姚歷代風物詩選》(姚業鑫等選注，1989 年 9 月印行)、《富春江名勝詩集》(申屠丹榮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第一版)、《名人筆下的樓外樓》(沈關忠、張渭林主編，1998 年 3 月印行)、《歷代詠竹詩選》(安吉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百家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第一版)等。

會節文獻：近十數年來，浙江一地的各種會節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其數量之多、聲勢之隆在國內少有伯仲；所謂會節搭台，經濟唱戲，旨在宣揚地域優勢，吸引世人眼球，為發展地方經濟服務。杭州的西湖博覽會、寧波的國際服裝節等已舉辦多屆，名聲在外；紹興一地有黃酒節、蘭亭書法節、吼山桃花節、蘭花節等；以地方特色為主題的如海寧觀潮節、普陀山觀音節、舟山沙雕節、象山開漁節、青田石雕節、浦江書畫節等；以土特產為主題的有湖筆、楊梅、胡柚、柑桔、葡萄及菊花等節；以地方支柱產業為主題的有嵊州領帶、海寧皮革、義烏小商品、余姚塑膠製品、樂清電器等會節。伴隨這些會節的召開，各地有大量相關的宣傳、匯

總類文獻資料產生，此類文獻資料普遍具有印製精美、時效性強、散冊薄頁居多等特點；浙江圖書館已開始關注這些日益增多的會節文獻的搜集與收藏。

(七) 專題資料彙編(人口普查、資源普查、法規彙編、民間文藝等)

主要的成系列出版的有：《浙江省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5)》(浙江省人口普查辦公室等編，1986 年印行)及各市、縣歷次人口普查資料，《浙江省法規規章大全》(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編，新華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第一版)、《浙江省地方性法規彙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1994 年已出四編，1995 年後每年一編，已出至 2001 年)及各市縣法規彙編，《浙江省工業普查資料》及農業、國土資源等普查資料；《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季沈主編，中國 ISBN 中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另有歌謠、諺語、民間器樂集成等)，浙江各市、縣的民間文學、故事均各單獨成卷，成系列出版。其他較有特色的如：《新浙江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浙江省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一版)、《1987 年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資料/浙江分冊》、《浙江海島資源綜合調查與研究》(宋小棣主編，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市政普查綜覽》(浙江省城市市政公用設施普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編，杭州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寧波市國土資源》(寧波市計劃委員會、寧波市國土開發與整治辦公室編，中國計劃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第一版)等。

(八) 地方叢書、文獻彙編(含書目)

1. 地方叢書，浙江有傳統和優勢，清末民初大量的郡邑叢書如《四明叢書》等，屬彙編性質。當今多為編撰，如《浙江文化史話叢書》(吳光主編，



寧波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共 7 種）、《西湖文化博覽叢書》（第一輯共 5 種，杭州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杭州歷史叢編》（周峰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一版，共 6 種）、《甌越文化叢書》（戈悟覺主編，作家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第一版，共 12 種）、《浙江文史集萃》（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共 7 種）等。還有古舊籍重印的，如《西湖文獻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共 5 種）、《四明談助》（寧波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第一版）等；青田、東陽、義烏等地也正在編印此類書。

2. 地方文集（紀念文集、論文集），如《浙江文博七十年文萃》（鮑賢倫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浙江圖書館百年學術論文選》（李性忠主編，中華書局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天一閣論叢》（虞浩旭主編，寧波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浙江煙草論文集》（浙江省煙草學會編，1991 年 12 月印行）、《浙江省出版論文選》（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協會編，1988 年起已出五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第五集第一版）等。

3. 地方書目、研究書目，主要的有：《兩浙著述考》（宋慈抱原著，項士元審訂，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第一版）、《浙江方志考》（洪煥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第一版）、《紹興地方文獻考錄》（陳橋驛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1 月第一版）、《金華圖書概覽》（王少傑、李也紅主編，大連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省公共圖書館新編地方誌聯合目錄》（鄭永富主編，寧波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第一版）、《浙江文獻叢考》（洪煥椿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2 月第一版）《浙江地方史論文資料索引（1949—1981）》（杭州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1982 年 9 月印行等。

（九）企事業名錄、指南

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地方名錄類圖書近年來編印甚多，操辦的有政府主管部門，但更多商業運作，故其名目也雜，內容不少帶有廣告性質。已出的主要名錄如《浙江省工業企業名錄》（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工業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編，1996 年 10 月印行）、《浙江工商企業名錄》（雷力行、金雨困主編，新華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第一版）、《浙江第三產業企業名錄（1993）》（劉關根主編，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第一版）、《溫州制革制鞋企業名錄》（中國皮革工業資訊中心編，1997 年 9 月印行）、《杭州市基本單位名錄》（杭州市基本單位普查辦公室編，1999 年 9 月印行）、（其他市，或名大全、或名普查資料彙編等，皆有）、《浙江石油化學工業》（范旺初、羅國屏主編，1989 年 3 月印行）（環保產業、電子工業、建築工業等行業也有）、《浙江省檔案館指南》（浙江省檔案館編，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省群眾藝術館與文化館概覽》（鄭永富主編，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求醫指南》（李蘭娟、張承烈主編，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全國駐杭州辦事機構概況》（陸順榮主編，杭州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一版）等。此外，商品、產品類名錄也為數不少，如《中國商品指南/浙江分冊》（陳復東主編，人民郵電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第一版）、金華的《金華網路大全》、義烏的《外貿商情網》、《外貿商品彙編》等，各地編有不少。

（十）地圖

自從明嘉靖二十年（1541）浙江省第一幅行政區域圖《浙江輿圖》出現，四百多年來浙江各地的地圖生產延綿不絕，品種日益繁多。當代的浙江地圖，其種類，以政區圖為主體，兼有各種功能圖（交



通、旅遊、生活、商務、資源分佈、購物、消防、醫療、樓市等)；近年來各種專題性功能地圖有越出越多趨勢。其形制，有簿冊式或折幅式，以後者居多；也有製成掛曆或工藝品等形式的。其載體，以紙質為主，也有綢、金屬、電子等。除單獨出版外，在新編地方誌和地方年鑒等文獻中也有大量的地圖存在。目前，由於城市建設的快速推進及市場經濟因素，浙江的地圖生產呈現多方介入、更新頻繁的特點，許多地區一年中出版的地圖多達十數種。

較有特色的地圖如《浙江省情地圖集》(浙江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浙江省測繪局主編，中國地圖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本書作為浙江省志的一種，共 184 頁；內容包括政區圖、地勢圖、國民生產總值圖、產業結構圖、城鄉人民生活狀況圖、科技教育圖、對外經濟貿易圖、各種資源分佈圖，及各市、縣、鎮區域圖等。《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說》(闕維民編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該書 302 頁，其主體部分即下編為杭州及西湖自南宋至現代的歷代地圖彙考。

以上十大門類為當代浙江地方文獻的主幹組成，主要是從該類文獻歷史的淵源、顯著和穩定的特徵、現實的活力與影響及較多的數量要求等因素考慮；欲再細分，還可以有一些較重要的其他門類，如：

(十一)人物傳介及研究資料

這是與地方名人有關的文獻。浙江人傑地靈，歷代才俊多若繁星，近年來各地為弘揚前賢先進、激勵當今後人，編刊了大量介紹、研究地方人物類文獻，主要有：《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單錦珩、周望生主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一版，正編；方志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第一版，續編)、《浙江歷代名人錄》(徐吉軍、丁堅之編著，杭州大學

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一版)、《浙江教育名人》(謝恩光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一版)、《浙江院士》、《紹興名人辭典》(朱順佐等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4 年 6 月第一版)、《湖州人物志》(張西遷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第一版)、《寧波幫大辭典》(金普森、孫善根主編，寧波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第一版)、《臨海市名人名家傳集》(牟仁音、邵志根主編，方志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溫州歷史人物》(溫州市檔案局編，今日中國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義烏名人錄》(義烏名人叢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在臺灣的永康人》(永康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1999 年 3 月印行)等，均收羅巨集富、規模可觀、編制精緻。

有關個人的更多，如《吳昌碩》(安吉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西泠印社會性 1993 年 3 月第一版)、《虞洽卿研究》(金普森主編，寧波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一版)、《陳佈雷傳》(王泰棟著，東方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第一版)、《沈鈞儒年譜》(沈譜、沈人驊編，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第一版)及《湯恩伯史料專輯》(武義縣政協文史與學習委員會編，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俞平伯研究資料》(孫玉蓉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7 月第一版)、《孫詒讓紀念論文集》(瑞安市文化局編，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等。還有，有關個人的文集因有助於其人研究，也可歸之此處，已出的有《黃宗羲全集》(沈善洪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一版)、《李漁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第一版)、《蔡元培全集》(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等。

(十二)政協文史資料

係各地各級政協文史委員會所編，包括省、



市、縣三級，數十年連續編印，故至今已形成橫貫縱連、自成體系的一類。其內容以「三親資料」（親見、親聞、親歷）見長，往往有專輯，如武義的湯恩伯，奉化的蔣氏，江山的軍統，及各地的工商史料、軼聞掌故等。

(十三)電話號簿及郵用品

包括各地的黃頁號簿、電話號碼簿，郵遞區號簿及明信片、首日封、郵票等。

(十四)圖照集

地方文獻歷來重視圖照的功能，從唐宋的圖經至當今的圖錄，一脈相承，發揚光大。浙江當代所出圖照集有反映社會狀態的，自然的，遺存的；有專題的，一地的，一館的；有成冊的，散頁的；做了許多搜集、甄別、匯總及推廣圖存的事。較有影響的如《浙江百年滄桑》、《浙江人民革命史畫冊》、《足跡—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浙江》（樂子型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日月換新天—寧波五十年掠影》（方平主編，寧波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浙江考古精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文物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浙江太平天國革命文物圖錄選編》（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杭州市城市建設五十年十佳》（顧梅英主編，中國人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老照片新杭州》（顧樹森主編，杭州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中國傳統民居圖說/越都篇》（單德啓、盧強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留住城市的腳印—杭州老房子存照》（吳仲泉等編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嘉興影蹤》（寇林主編，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紹興古橋》（紹興市城市建設檔案館編，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浙江七千年—浙江省博物館藏品集》（該書編委會

編，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寧波文物集萃》（董貽安主編，華夏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等，及各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館藏圖照集等。

2002年，浙江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開始組織編纂《浙江省城市圖鑒》，一年一編，或可再新耳目。

三、當代浙江地方文獻的特點

當代浙江地方文獻的產出，可以數量龐大、種類豐富、涵蓋廣泛、注重功能概之。分析其特點，給人印象較深的至少有下列幾點：

(一)圖書類文獻編刊活躍，增量，影響廣

在書、報、刊三種主要文獻形態中，圖書因其相對寬鬆的管理制度及出版發行方式靈活、容納量大、易收藏保存等特點，成為當代地方文獻出版的最主要形態。近二十年來，圖書類地方文獻的出版較前增幅迅猛，以十數倍計，而同一時期報刊的數量卻變化甚少，經多次整頓，90年代起甚至在不斷減縮；據《浙江出版年鑒（1999年）》統計，1998年浙江省有正式批號的報刊分別為報83種、刊177種，另有數百種報刊經登記准印以「內部資料」形式出版，限於內部交流；報刊批號已成為十分難得的珍貴資源。比較而言，圖書的出版則相對容易得多，目前至少有三種出書渠道。

一是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地方文獻類圖書因其發行面較窄，多以合作出版方式進行，即交出版社一筆管理費，辦一個書號，著者自主編著，自辦發行，出版社與編者兩相情願，各得其所。

二是以准印證形式出版，無正式國際書號，其編印質量、裝幀等從整體上看普遍遜於正式出版圖書，但出版費用便宜，故在當代地方文獻中佔有很大比例。像縣一級的統計年鑒、政協文史資料、民



(三)加強圖書館利用教育實施

「圖書館利用教育」可以說是九年一貫課程最佳的輔導老師，從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的十大基本能力與七大學習領域，足可印證圖書館利用的重要性，十大基本能力中曾提到爲了「增進規劃、組織與實踐的知能」與「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正好驗證了一句話「知識有兩種，一種是知識的本身，另一種是求得知識的方法」。因此新的教學方法應該在教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給他一條魚吃，不如教他如何釣魚，讓學生知道找資料的方法，如何善用各種媒體資料。因此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與教學是分不開，應是緊密結合爲一體。「圖書館館藏資源」是課程教學的硬體設施，而「圖書館利用教育」則是課程支援的軟體設施，換言之，圖書館利用教育在課程支援中具備相當關鍵的角色，學生假若具備圖書館利用的能力，對於他們的學習是有相當大的助益。

五、合科教學對館藏發展政策訂定的影響

單科與合科教學在學校圖書館對於學科範圍的訂定將造成挑戰，九年一貫課程的一項重大改革就是「合科教學」的實施，合科教學理論是將每個學習個體視爲擁有不同潛能或智慧，我們不能用傳統固定的模式去框限他，而應設法針對學習個體的需求提供積極的協助，使其潛在能力有萌芽吐葉的機會。合科教學建議教師在安排教學活動時，應該要同時兼顧各種智慧領域的學習內容。然而在館藏發展政策訂定的「學科範圍」項目中，應詳細列出館藏學科範圍，並要說明各學科的館藏深度、語言、資料年份、地區、資料類型、選書責任等。(註10)館藏學科範圍的訂定，可以明確指出圖書館的館藏特色與其各資料的分配情況，但是由於九年一貫課程所主張的合科教學的實施，傳統館藏發展政策中對於「學科範圍」的訂定是否符合目標九年一

貫之合科教學的需求，這對學生在進行合科方式的學習過程中，是否帶來影響？其應該於「學科範圍」項目中增列九年一貫課程所主張之「七大學習領域」之內容細則，九年一貫課程將學習分爲七大領域，分別以七大學習領域爲學生學習課程做規劃：(1)語文；(2)健康與體能；(3)社會；(4)藝術與人文素養；(5)數學；(6)自然與科技；(7)綜合活動。在訂定館藏發展政策中之「學科範圍」時，應將此七大學習領域導入，並能說明各領域之中各學科的館藏深度、語言、資料年份、地區、資料類型、選書責任等。

六、教學資源中心發展對館藏發展政策的影響

教育部計劃於民國86年7月至96年6月期間實施「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劃」，在此計劃中已出現「教學資源中心」之名詞，並標明藉由「擴大圖書館功能」以達教學資源中心設立之目的。在此計劃短期目標(民國86年7月至90年6月)的7項工作中，已列入「推動調整組織制度：結合各校圖書館人力，擴大圖書館功能，朝教學資源中心發展。」(註11)可見未來正式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教育後，圖書館資源之整合與運用將是九年一貫課程推動的重要關鍵，目前也傾向將視聽中心、語言教室、電腦輔助教學中心等與圖書館統合設置，使之成爲全校教學資源中心，此構想勢必成爲未來學校圖書館所應面臨的重大變革。再加上九年一貫統整課程與彈性課程的實施，學校圖書館轉變成爲教學資源中心的可行性就更爲提高。

有鑒於此，學校圖書館在轉型成爲教學資源中心後，館藏發展政策的適用性將遭受嚴格的考驗，但其原有之功能與目的仍是不變的。圖書館轉型成爲教學資源中心的過渡時期中，仍然扮演教學資源提供者之角色，因此圖書館不應怠忽現行館藏與服務所應擔負的職責，就館藏發展方面，必須注意到未來與原屬各單位資源整合的問題，原屬各單位所



間文學集成等基本都以這一形式出版。

三是連准印證也沒有自行其事印行的圖書，各機構、單位的彙總性資料、業務資料、年報及各地電話號簿、村志、宗譜等均是。

上述三種渠道殊途同歸，彙集成當代浙江地方文獻的主流，其年產圖書總量應在三千種以上。

(二)出版特徵上表現為省外出版多、非正式出版圖書多、市場運作趨多的「三多」現象

鑒於目前出版業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圖書跨地域出版已司空見慣，正式出版的圖書中，省外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地方文獻已遠遠多於本省所出，以下兩個分析很能說明問題：

一是浙江省 14 家出版社 1997、1998 兩年共出版圖書 6,747 種，其中內容涉及浙江的有 170 種，約占總數的 2.5%（據《浙江出版年鑒》1998、1999 年版），可見本省出版物中地方文獻比例之低。

二是已出版的當代浙江重要地方文獻品種如方志、年鑒中，省外出版社所出比例甚高。以省市級方志為例，在目前已出版的 35 種省級志中僅有 5 種是浙江的出版社所出，餘 30 種均為中華書局等省外出版；在浙江省全部 11 種市（地）級綜合志中也有 5 種是省外出版。而正式出版的浙江地方年鑒大多數為省外出版物。更有甚者如地圖，由於浙江省內無一家地圖專業出版社，故有關浙江的各類地圖幾乎全是外省出版物。此外，浙江著者的一些散文、雜記、回憶錄等多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還有一種現象近年來日趨顯著，就是利用香港的書號出版，這是由於香港地區的出版社書號費用遠較內地便宜，故浙江許多的個人文集、書畫作品集走此途徑。

非正式出版圖書多，這裏指沒有正式書號的圖書，包括無正式書號但有准印證的和無任何手續自行印行的。前已述及，這兩類圖書的數量甚多，總數應遠超正式出版圖書，儘管在整體質量、社會影

響等方面或有不及，但因其勢眾面廣的特點，仍不可小覷。

市場運作漸多，這也是當前圖書出版行業普遍趨勢，如各地的地圖出版，因其利潤可觀，新華書店、方志辦等機構紛紛介入，組織編繪，每年新出頗多；又如企事業名錄、商務手冊及商品（產品）目錄等也多為市場運作的產物。

(三)內容上廣泛多樣，種類齊全，功能上互補性強，注重現實效益

浙江當代地方文獻經過二十餘年的生產、累積，已基本形成以省、市、縣三級文獻為主體網路，涵蓋廣泛、種類齊全、功能多樣的文獻體系，這棵大樹主幹茁壯、枝葉繁茂，生機勃勃。有兩點尤其值得一提：

一是綜合性集成性文獻與專題性專指性文獻兩翼齊飛，並結碩果。《浙江通史》、《浙江古今人物大辭典》、《台州會要》及省市主要方志等大投入、大製作文獻縱橫古今，綜覽全面，構成了浙江當代地方文獻的基礎和骨骼，許多堪以傳世；《梁祝文化大觀》（周靜書主編，中華書局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紹興古戲臺》（謝湧濤、高軍編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第一版）、《東陽明清住宅》（洪鐵城著，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浙江茶文化》、《昌化石志》等小處著眼，深挖主題，在專題資料發掘和研究方面各樹一幟，使浙江當代地方文獻更顯豐滿多彩。大而全與小而專相輔相成，形成優勢互補，功能互補。

二是發掘、整理、彙編歷史文獻與記錄、總結當代現時資料並重，前者如《浙江百年滄桑》、《甌越文化叢書》、《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說》、《湯壽潛史料專輯》等，其搜羅、搶救與傳播之功不小；後者如《新浙江五十年》、《杭州二十年巨變》、《2002 年浙江發展報告（社會、經濟卷）》及各種地方性



年鑒等，在提供現時資訊、留存當今史料方面作出貢獻。浙江當代文獻注重基礎建設、注重現實功效的特色已在實踐中得到較好驗證，浙江圖書館新闢的地方文獻閱覽室在2001年共為讀者提供圖書類地方文獻8,605種（冊），其中新編地方誌、地方年鑒兩類就占5,346種（冊），比例高達62%；方志和年鑒的年利用率分別為212%和502%（據該館當年業務統計資料）。

(四)政府、機構、民間多方介入，形成充滿活力的文獻生產機制

浙江當代地方文獻的編刊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狀之；各級地方政府、各機構單位及民間個人對地方文獻的編刊熱情高漲，三個積極性合成一起，三股力量匯聚一道，使地方文獻的生產出現各擅其勝，相得益彰的生動活潑的局面。首先，因了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視和支援，實施有序規劃，有力組織，大量投入，得以產生一大批品位高、規模大、製作精、份量重、堪以傳世的基礎性、主流性文獻，如《浙江通史》、《台州會要》等；其倡導和主體作用顯著。其次，各機構團體的積極參與，產生了大量以機構、單位為單元的史志、年報、資料彙編、藏品集、紀念集、論文集等類文獻，構成了當代浙江地方文獻中數量龐大、種類繁富的部分。再說民間，藏龍臥虎，高人異材不可勝數，雖難免財力單薄，但志趣和專長終究使一部部文獻於艱難中嶄露頭角，異彩紛呈，涓流匯聚，形成了當代地方文獻

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補充和組成；又因其少有約束，故民間所出地方文獻在內容、形式等方面更顯鮮活多樣。宗譜、個人詩文集、書畫集、回憶錄等是其大宗，《諸葛村》、《黃宗羲年譜》、《昌化石志》等可算代表。

(五)現實需求與傳統力量的結合是當代地方文獻繁榮的主因

應該說近二十餘年來浙江各地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整體實力的大幅提升，及較為發達的市場經濟程度是浙江地方文獻持續高產並日趨旺盛的時代背景和基礎條件。作為市場大省、外貿大省的浙江，其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已位居國內前列，並表現出方興未艾的活力和潛能；省內各地龍騰虎躍，逐鹿爭雄之勢態從競相舉辦的令人目眩的各種會節中可見一斑。總結今天，著眼未來，宣揚地域優勢，吸引世人眼目；經濟一體化趨勢的急迫步伐已成為地方文獻生產的強大推力。盛世修典、遺澤後來的悠久傳統也對當代地方文獻編刊高潮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如是，現實的需求與傳統的力量相結合，便利的出版條件與較強的經濟實力為後盾，浙江當代地方文獻呈現絳紫嫣紅的可喜景象是水到渠成的事。

(收稿日期：2002年4月8日)



唯有加強圖書館的人員配置、館藏資源與服務，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才能如魚得水。為了因應社會變遷與時代的需求，教育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一項重大革新，但革新就必須要有成長，此應當是教育界與圖書館界應當警惕深思的一個課題。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趨勢所求，但假若沒有洗刷傳統根深蒂固未待解釋之問題，要實現新制度與新措施將是寸步難行。因此要貫徹九年一貫教改政策的必要工作項

目之一，應該是提升學校圖書館的館藏，藉以配合教學需求，使老師與學生在教學上及學習上擁有暢通之管道。因應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中小學圖書館如不加足馬力，提升教育品質與終身教育實現之日將遙遙無期。

(收稿日期：2002年7月26日)

註釋：

- 註 1：中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台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國 89 年），頁 21。
- 註 2：吳清基，「推動九年一貫新課程教師成長與研究發展」，開創課程新世紀：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教學研討會，民國 90 年 3 月 3 日，<<http://www.ntnu.edu.tw/csd/kao/kao8/1-3.htm>> (7 April 2002)。
- 註 3：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圖書館年鑑（台北市：國家圖書館，民國 89 年），頁 198-200。
- 註 4：「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台(89)國字第 89122368 號令，民國 89 年 9 月 30 日公布。
- 註 5：張世忠著，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臺北市：五南，民國 90 年），頁 28-30。
- 註 6：同註 1，頁 193。
- 註 7：曾雪娥，「學校圖書館利用與課程教材教法的結合」，書苑 21 期（民國 83 年 7 月），頁 10。
- 註 8：同註 5。
- 註 9：同註 3，頁 199。
- 註 10：林美和，「學校圖書館支援教學活動應有的理念與做法」，高中圖書館館訊 7 期（民國 83 年 3 月），頁 68。
- 註 11：「專案報告『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劃』」，民國 87 年 4 月 15 日，<<http://www.edu.tw/minister/compool/pres353.html>> (7 April 2002)。
- 註 12：同註 10，頁 6。

